

20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生产

苏桂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生产

苏桂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生产 / 苏桂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203-0887-8

I. ①2… II. ①苏…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20世纪②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044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19千字
定价 6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 本书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目 录

绪论	(1)
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	(2)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4)
三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生产	(7)
第一章 清末知识分子及知识生产形态	(13)
一 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	(13)
二 变革与启蒙中的知识分子及知识生产	(23)
三 现代教育及现代知识的设计	(38)
四 科举废除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迷茫	(45)
第二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转换	(49)
一 现代报刊传媒与知识的生产传播	(49)
二 民间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	(52)
三 传统文化批判与知识更新	(60)
第三章 知识的茫然与彷徨中的知识分子	(82)
一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	(82)
二 早期留学生形象	(94)
三 寻求生活意义的知识分子	(103)
第四章 知识分子与知识的重组	(119)
一 知识生产条件和生产制度的建设	(120)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知识统一建构	(126)

三	知识生产者的定位	(138)
第五章	现代知识建设的困惑	(149)
一	知识分子的定位及知识再造机制的建立	(149)
二	红色光环下的知识焦虑	(152)
三	外来知识的介入	(162)
第六章	寻求身份的惶惑	(170)
一	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170)
二	体制化知识生产的加强	(181)
三	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讨论	(190)
第七章	大众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知识生产	(196)
一	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的知识化	(196)
二	大众文化条件下的知识生产	(202)
第八章	现代知识生产的商业化	(211)
一	知识生产的商业化动力	(211)
二	知识生产的资本化	(214)
三	商业化的知识生产运作	(219)
四	知识的营销与消费	(223)
五	知识效益	(231)
第九章	现代知识伦理秩序的建立	(235)
一	现代知识生产的序理化	(235)
二	经济秩序与知识秩序	(239)
三	知识资源的分配	(243)
四	知识阶级的重组	(247)
后记	(252)

绪 论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动荡的年代和曲折的变化，从他们的身份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国知识分子既是中国现代知识的生产者，同时也被他们生产的知识所生产。

20 世纪中国的知识生产经历了对旧文化知识系统的批判和扬弃的过程，也经历了对现代知识选择和建构的过程，并且在这样的变化中形成了现有的知识形态。

20 世纪所形成的知识谱系是相当复杂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因素，又有现代西方文化知识的渗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在这个文化知识的建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知识消失了，被无情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知识积淀下来，被人们所熟悉，以至习以为常，并主宰社会的生活。这些知识曾经在历史上经历了血与火的抗争，形成了一定的权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知识。它逐渐地形成了关于知识的成分以及知识的谱系，在社会的权力网络中形成自身的运作力量。

对 20 世纪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的考察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这其中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形形色色的、庞杂的知识成分及所构成的关系非常复杂。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不同的政治时期，其社会运作的机制也不尽相同，而且还有巨大的反差，在其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也形成

了不同的知识生产层次，产生了不同的知识形态。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身处其中的知识形态。

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的传统知识系统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已经相当完善。它有一整套关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也有关于知识分子存在意义和存在方式的描述。

这里面包含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群体和形象。其中有进入统治阶层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拥有教育和受教育的特殊权利；另外，还有一部分民间的拥有某种知识的人群，他们拥有关于儒家、道教、佛教、巫术、卜卦以及各种民间知识，并且能够以这些知识对社会产生影响。

显然，不能够以现代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中国特定的文化条件讨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其特定的文化系统中生产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生产机制。其社会的运作规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必须按照相应的社会规则生活。

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掌握一定的技能。文字书写被认为是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文字符号掌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知识分子的特定权利。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在中国，文字书写是知识分子和大众截然分开的表现。在印度和中国，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①

文字书写成为知识分子权力合法性的最大的支持。能够进行文字书写，实际上是拥有了特定的文化权力：一方面，它具有承传传统知识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借助传统知识权力对现实社会进行统治。他们可以运用传统知识积淀的力量对现实社会实施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个人的权力意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文化系统的话语之中，这套话语成为他们从事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他们也运用这套话语将自己的知识系统塑造得十分完美。它形成稳固的结构，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有自己的声音及腔调，对社会形成可控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套话语，将族群、社会、国家、民族有效地整合在一起，让的民众产生认同感，并且对民众实施有效的统治。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宗法制度所产生的知识，它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及道教和佛教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了相当严密的伦理秩序以及强大的权力，并获得国家机器和民间力量的保障。它在相当完善的文化系统中形成稳固的知识关系，并有效地控制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过程。

传统知识分子依赖这些知识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是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众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些知识使传统知识分子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权，并且占据了社会较多的资源和较高的地位。

在儒家的知识系统中，知识分子的成就目标十分明确，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稳固的人生指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知识生产系统基本是围绕着这样的人生目标进行组织运作，中国传统的教育机制以及科举制度也是围绕着这一个人生目标设计的。知识分子要做到内圣外王，这样既能达到个人修身的目的，同时又能有效地服务于王权，对社会起到稳定的作用。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有完整的教育思想和知识体系为其服务。“传统学校主张寡头政治，因为它的目的在培养注定要做统治者的新一代统治阶级，但它的教学方式并不具有寡头政治性质。”^①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 页。

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知识强调严格的宗法社会的伦理内容，树立起这方面的标杆，每一个人必须按照这样的知识伦理进入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的知识系统偏重于伦理性的知识，强调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关系达到相对平衡。

围绕这个知识核心，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应该是相当完备。同时，在完成了这个序列的教育，掌握相关的知识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进入国家机器，成为国家机器运作的某个部分，同时生产相关的知识。国家机器有效地保障了这个知识系统的运作，并且以自身的权力规定相关的知识范围，形成相关的价值取向。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面临新的变化，他们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现代社会出现了问题，也因此对中国文化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中国现代知识以及知识分子转化的关键时期，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知识的影响而直接发生了变化。

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力量进入中国，其背后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作为支撑，它不断地冲击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系统，使这个貌似固若金汤的文化知识系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并最终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

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困境，按照传统的知识条件，他们甚至感觉到不能够再生存下去。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伦理知识体系让他们在现代的转化中束手无策，感觉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因此不得不提出改良中国传统知识的建议，甚至对中国传统知识进行革命性改变的实践。

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们对中国传统知识失去了信心，同时接受了西方文化知识的洗礼，有意识地进行现代知识的生产。

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上，他们比自己的前辈增加了更多的西方知识，尤其是关于科学的知识。一些人如饥似渴地吸收这些知识，并试图将之转化为被中国所利用的知识，甚至还试图以西方知识代替中国的知识，使中国富强起来。

这个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西方知识的元素，也有吸收西方知识的强烈的渴望，同时还希望把这些知识运用到中国的文化改良之中，并积极地从事相关的实践活动。

这些知识分子试图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挣脱出来。他们对传统的知识体系相当熟悉，有些人甚至深陷其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在西方知识的参照下，可以比较出两种不同文化知识体系的差异，从知识功能方面感受到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别，也因此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并对其采取批判的态度。

这是一个正在转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就如葛兰西所描绘的：“城市型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他们同工业的命运息息相关。”“乡村型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传统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农民社会大众以及城镇（尤其是小城镇）小资产阶级相关联，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熏染和驱动。”^①

19世纪末，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893）已经相当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从社会实体到精神领域，借助西方的知识标杆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文化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判。

这种批判的姿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直到“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不断批判中充实自己的知识领域，逐渐探求未来知识的建构目标。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意义在于，他们在20世纪初试图为中国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引进新的知识，并且要使社会按照这些知识轨道运作。他们一方面对传统知识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激烈批判；另一方面寻找能够置换中国传统知识的新的知识体系。

对旧知识的批判与现代知识的建构处在交错之中，少数激进分子对中国传统知识采取了绝对的否定态度，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却与传统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们也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存在种种弊病，但是，他们又必须依赖传统的知识生存，传统的知识系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即便是那些激烈批判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从西方吸收知识以外，更多的批判标准也仍然来自中国传统的知识标准和经验。

在这个过渡的阶段，中国现代知识的建构不断地进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试图把外来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使它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比如说中体西用，就是这种愿望的最恰当的表述。以中国知识为主体，其核心价值不改变，同时吸收西方知识的功能，为这个主体服务，这种美好的协调愿望在激烈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冲击。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大量地吸收西方的文化知识，西方文化知识是经历过西方近代大工业文化洗礼的，而且被认为是使欧洲富强起来的知识体系。尽管阻力重重，那些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仍然努力地推广西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的文化知识建构进行设计和实践。

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两重任务，即对中国传统知识进行批判否定；同时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文化知识，以建构中国的知识体系。

否定原有知识系统的阻力相当大，因为这个知识系统已在中国运作几千年，形成了体系稳固的文化知识模块和运作完整的机制。但是，由于有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原有文化知识的外壳，这就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知识的批判和否定。

新的知识系统的建构实际上也面临着相当混乱的局面。在引进

西方知识的过程中，中国早期只强调了单方面的知识引进，只强调了技术层面的引进，也就是“师夷之长技”，而对相关的政治经济知识以及道德知识进行排斥，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文化远胜于西方相关领域的水平，没有必要引进。这种不相配套的知识嫁接所形成的弱点很快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显现出来。这个代价是惨痛的，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对西方知识的全面引进，以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便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环境中转化，不断地加入现代的知识成分，并逐渐地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

三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生产

不妨将中国现代的文化建构看成是一次相当有效的知识生产过程，它与传统的知识生产有很大的区别。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知识需求。它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中出现，在复杂的环境中产生。20 世纪的社会发展给中国现代知识生产提供了独特的环境。

福柯在其著作《词与物》中描述了知识生产，这其中有着相似性的方式。他说：“直到 16 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正是相似性才主要的引导着文本的注解和阐释；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了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①

福柯认为相似性有四种类型，那就是适合、仿效、类推、交感。这是人类生产知识的最常用的做法。但是，17 世纪以后，相似性被赶到了知识的周边地区，知识最低级和最低下的边缘。^② 福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3 页。

② 同上书，第 95 页。

柯认为，相似性并没有打开通向阐释科学的道路，随之出现了一门普遍秩序科学的设想，也就是给出事物以秩序。

这就是另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即秩序化的方式。它把不同的知识碎片秩序化，使之互相联系，成为具有意义的知识结构。这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主义的过程。不同的知识结构有自身的秩序化的方式，它围绕特定的核心价值运作，形成以这个核心价值辐射出来的网络结构。它把相关的碎片吸附在这个网络结构上，使之产生相关的意义，并且辐射出某种特定的权力。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现代国家，尤其是强权国家非常普遍和有效。

当人们给复杂的事物以秩序时，就必须构造一个分类学，确立一个符号体系。这是一个独特的知识系统。

在 20 世纪中国的知识建构中，知识的生产元素和生产方式是形形色色的，古今中外的知识元素以及权力混杂其中，形成了中国式的知识生产体系。这种在后来被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也是被不同的知识元素构造起来的知识形态。

普遍秩序的科学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实际上也是知识生产的训练。不同背景下的知识生产的训练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发人的相关智力以及能力。

对知识生产的关注，或者说关于知识的考古学给我们拓展了思路，考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知识生产的源流以及知识生产的方式，还包括考察各种知识所形成的权力过程，尤其是后者，也就是知识权力的形成更加显示了不同系统的知识运作的关系。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现代知识生产的三个重要的时期，也称为三个重要的知识板块的建构。

第一个是 20 世纪初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知识生产和建构；第二个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由红色政治建立起来的红色知识系统；第三个就是 20 世纪末大众文化兴起以后的知识生产形态。

这三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投入其中，自身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生产知识，同时也被其生产的知识所生产，或者称之为异

化。中国现代知识的生产，知识分子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社会权力渗透知识生产之中，政治因素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因素。政治化的知识生产成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的主流。其知识生产者，也就是被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非常有效地生产出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知识形态。极端政治化的知识形态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社会。

在这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频繁不断的战争，尤其是经历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就使得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知识生产失去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也缺乏相对明确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在动荡不安中不断地调整知识生产的价值关系。不同政党的政治观念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观念的产生，都对以后的知识生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20 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文化转折的重要时期，其知识生产从最初的设计到发展都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建构新的知识系统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的重要时期，它是从旧的知识系统转向新的知识系统的生产和建构的过程。

这个时期的知识建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试图改造原有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试图建立起新的知识系统，它以引进外来知识作为建构新知识的重要依据和参照。

新知识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西方的文化知识。在此之前，这种文化知识曾经通过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武力的方式证明了它的强大，打破了中国曾经自认为固若金汤的文化知识系统，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对此不以为然，但是，现实中强大的外来力量却又不得不让中国民众受到极大的震动。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要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至少要在技术层面上向西方学习。在这之后，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学习，还包括了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学习。

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在 19 世纪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改造中国传统知识，学习西方知识的必要性。到 20 世纪 30 年代，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口号，这是更大的变化，尽管这种要求最终没有实现，但它意味着中国原有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了否定。

中国现代知识生产除了民间的人文知识分子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官僚体制的知识分子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知识的生产。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他们秉承中国传统官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王权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化知识，并推动中国现代知识的改变。

20 世纪上半叶，是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的时期；20 世纪下半叶，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占据了绝对的位置。

1950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强大而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器，对整个国家，包括政治文化及其知识生产实施了非常有效的管理。

它迅速建立起知识生产的相关机构，包括教育机构以及文化管理机构；同时，迅速地建立起符合政权稳固的知识生产原则，并按照这个原则设计和规范所有的知识生产。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着的历史时期，为了建立新的知识系统，首先需要批判在这之前的传统知识，并从中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知识元素，按照自身的价值对知识进行重新整合。

高度政治化的管理是这个时期知识生产的重要特点。这个时期的新政权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经过长期战争动荡的国内局势尚未稳定，刚刚被推翻的政权还在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国内的各种力量和派别仍然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另外，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刚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和民族处在重新整合之中，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还有战争动乱，因此，采取高压的政策甚至激烈的手段稳固其政权也势在必行。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高度政治化的知识生产机制也似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此同时，以高度政治化的标准对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进

行严格的政治甄别，也成为基本的要求。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甄别出了不同的政治身份。新政权对他们的知识生产权力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通过国家机器对知识进行重新组合，以政治的标准筛选和淘汰不利于新政权建构的知识元素，重新创造了有利于新政权的知识元素和知识结构，是其知识生产的重要目标。

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一切知识生产都围绕着这一核心目标进行，知识分子在国家机器的强力保障下展开了新的知识系统的建设。

政治知识分子在掌握政权以后，又迅速地把这种东西方混合的知识借助国家机器加以推行，并在中国建立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政治权力的知识系统，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

20世纪末，大众文化迅速兴起，知识生产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改变了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形态。

知识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权力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知识生产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现代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知识生产不再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垄断，而是在更为广泛的条件中进行大众化的知识生产运作。

这就意味着，知识生产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使现代知识具有了更为复杂的结构，也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形态。

在大众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商业化的文化资本迅速地进入这个领域，并成为主宰现代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使得现代知识生产具有了相当浓厚的商业色彩，众多的知识产品成为商品。

大众化的知识生产是在现代市民社会迅速发育的过程中进行的，它拥有市民社会的广泛支持，也因此拥有非常深厚的发展基础。

这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知识社会，大众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大众文化的知识生产融汇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